

· 经济社会史 ·

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移研究*

陈 熙 徐 有 威

〔摘 要〕小三线建设是以一线城市的工厂内迁方式展开的，工人和家属随厂内迁成为了小三线建设的重要部分。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中七万余职工和家属经历了从城市被动员到山区，再从山区回调到城市的流转过程，形成这一时期特殊的人口迁移流。其中人口迁移与小三线建设工厂的转折兴衰密切相连，移民成为了观察小三线发展演变的一个切入口。研究认为，单纯依靠行政动员而牺牲经济利益的做法，使得小三线移民无法持久，尽管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在皖南落地 20 余载，但却始终未能在当地生根。

〔关键词〕上海后方基地；皖南；小三线建设；移民

〔中图分类号〕K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2-0106-13

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国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建设后方军工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三线建设运动。在全国性的大三线建设开展后不久，毛泽东便决定推广广东经验，要求一线省市在省内建设自己的常规武器基地，以便战时独立作战。相对于全国性的大三线建设，各省区市投资的以生产团级以下武器装备为主的地方军工则被称为小三线。由于大小三线皆以工厂内迁的“嫁接”方式开展，因此形成了规模浩大的自东向西的工业迁移流，而大批产业工人、家属和干部的随厂内迁，则构成了一股持续性的西进移民潮——或向西迁往西南西北腹地，或迁往省市区内后方山区。不同于这一时期其他以疏散城市过剩人口为目标的移民，三线移民的主要对象是生产性人口，以产业工人、部分家属和干部为主，因而在移民的动员、安置、管理以及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具有其独特性。

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学界对三线建设的原因、发展过程、产生的影响和历史意义等系列问题进行探讨，试图从中得到对西部大开发有益的经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陈东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①。此后，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细化，覆盖到三线建设的其他诸多领域，诸如对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与成因分析^②，对三线建设工业布局 and 城市化问题的探讨^③，三线企业的改造与调整^④等。然而，上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线建设中的大三线建设方面，而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仍十分薄弱。

近年来，小三线建设逐步进入学术界研究视野。目前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从区域视角着手，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上海、新疆、河北、福建和湖北等地小三线的研究^⑤。徐有威以及小三线建设研究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14XZS02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上海小三线建设研究”（2015M570320）。

- ①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
- ② 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43～51 页；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山东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89～93 页；等。
- ③ 段伟：《甘肃天水三线建设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128～136 页；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81～92 页。
- ④ 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43～51 页；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34～42 页；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85～91 页；徐有威、李云：《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开发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152～155 页。
- ⑤ 刘建民：《河北“小三线”建设的回顾与评价》，《高校社科信息》2004 年第 1 期，27～32 页；钟健英：《六十年代福建的“小三线”建设》，《福建党史月刊》1998 年第 5 期，第 23～25 页；谷桂秀：《闽北的小三线建设及其对当前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福建党史月刊》2012 年第 21 期，第 29～31 页。

团队就上海小三线问题进行了口述资料和档案资料的整理研究^①，段伟对曾作为上海小三线重镇的安徽宁国县的相关研究认为，小三线厂经改造后，对宁国县域经济和城镇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②。崔海霞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1965~1988年间上海小三线的社会生活面貌^③。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对小三线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工业建设拓展到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包括对小三线的民生问题^④、小三线职工的婚姻问题等^⑤。不过，目前的研究仍然极少涉及三线移民问题。

小三线职工在城市和后方之间的流动与小三线的兴衰起落密切相关，既是小三线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把握小三线发展脉络的切入口。在大量的基层档案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集中对上海小三线移民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达到管窥之效。

一 动 员

1965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和副市长宋季文带队到皖南进行实地勘察，并选定屯溪（安徽徽州地委所在地）为中心建设上海后方基地，即上海皖南小三线也称为上海后方基地。搬迁动员的试点工作随即展开。从7月4日开始，上海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先后在上海无线电二厂、上海服装厂、建筑工程局702工程队、粮食局油脂公司、复旦大学（中文、物理两个系）、普陀区胶州里委会、上海实验歌剧院、金山县金卫公社、奉贤江海公社秀南大队等九个基层单位进行了备战动员^⑥。突出强调战争威胁的紧迫性，号召民众积极做好备战工作，配合工厂和职工内迁。

然而，单一的备战理由并不足以完全说服工人内迁。工人中出现诸如“讲讲要防备打战，看看不像会打战，大搬家不合算”之类的看法^⑦。从上海迁到皖南山区，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要，却牺牲了个人的实际利益，不单是收入水平、粮食定量、生活条件等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分离等家庭社会方面。一份对三线迁厂职工的摸底报告称“许多人开始听到迁厂的消息，震动很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哭泣，有的埋怨”^⑧。“不少工人无心生产，生产逐日下降；有的女工们躲在厕所里放声哭泣；有的装疯、装病，保健室的病号也骤然增加起来。”^⑨有些工人表示“工厂可以搬，自己不愿去”^⑩。上海市支内领导小组将工人们的担忧归纳为“两留恋”“四害怕”：留恋上海大城市，留恋安宁团聚的小家庭；怕内地生活艰苦，怕降低收入增加开支，怕亲属分居两地，怕老死在外乡^⑪。这种类似焦虑情绪在小三线的移民动员过程中同样存在。

事实上，政府对于工人内迁可能遇到的困难有着清醒认识。八机部在一份关于上海动力机厂的

-
- ①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徐有威：《口述史和当代军事史研究——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例》，《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9~151页；徐有威：《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54~155页；陈东林主编，徐有威、宋毅军副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小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徐有威、陈东林编：《三线建设：在等待战争爆发的日子里》，《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44~73页；徐有威：《上海小三线口述史选编》（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282页；徐有威：《上海小三线口述史选编》（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8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304页；徐有威选编：《上海小三线报刊资料选编（1976~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267页；等。
- ② 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85~91页；《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县域分布特点的历史地理考察——以安徽省宁国县为例》，韩国《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82辑。
- ③ 崔海霞：《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3年。
- ④ 张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第145~153页；徐有威、李婷、吴静：《散落在皖南山区的海派文化》，李伦新等主编：《海派文化的创新发展和世界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86页。
- ⑤ 徐有威、吴静：《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年职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34~43页。
- ⑥ 《中共上海市宣传部关于备战的动员报告及宣传要点》（1965年7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22-2-1288。
- ⑦⑩⑪ 《上海市支援内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上海市工厂企业搬迁工作的情况报告》（1966年4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94-2。
- ⑧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上海五个厂迁往三线的工作报告》（1965年3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3-98。
- ⑨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迁厂动员工作中各类职工思想特点的分析报告》（1965年2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3-63。

搬迁报告中称“对工人的动员显然要比搬迁工厂设备要困难和复杂得多”^①。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觉悟。政治思想教育在此后的动员工作中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一机部称,职工的内迁“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各种人中去”,而“做好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好搬迁工作的根本保证”^②。上海市要求工厂和基层干部做到“建厂先建人”,并强调内迁必须建立在“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③。

在随后的动员工作中,内迁被不断赋予新的更高的革命价值和政治含义。内迁在宣传中被称为“是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④，“对缩小三个差别有着重大意义”^⑤，“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是为了彻底埋葬帝、修、反”^⑥。通过政治宣传,“使广大革命职工树立起支内建设的光荣感和责任感”^⑦。“文革”开始之后,内迁又被赋予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第一轻工业部在1966年10月向内迁工厂职工发出号召称:“支援三线建设……乘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东风”,教育职工和家属应积极服从国家需要,听从调动,愉快内迁^⑧。

除了正面的号召外,思想动员还给那些不愿意配合的职工施加压力。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大批判为武器”^⑨，“狠抓二条路线斗争教育”的方式^⑩,抵消职工对实际利益的个人盘算。上海良工阀门厂在动员工作总结中称:“思想教育……使每个职工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识大体、顾大局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支援内地成为群众自觉的要求。”^⑪在类似的政治动员当中,工人们不得不在国家要求和个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动员的压力并不仅仅针对工人,有时也指向那些对迁厂不太热心的基层工厂领导。一机部在西北会议上表示,少支援一个人就是“反党”,微型电机厂党委副书记王震中听后,担心被人戴上本位主义的帽子,因此在支内职工的安排上任由上级安排,不敢有异议^⑫。上海工程机械厂对内迁提出不同看法,结果“被扣了很多帽子,说支援内地不积极、本位主义等等”^⑬。

思想政治动员的效果是显著的。“在经过厂的领导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层层做思想工作……百分之九十八的群众都还是响应了党的号召而奔赴内地参加建设。”^⑭电器研究所所长崔镇华表示,在内迁过程中,那些不愿意去的,后来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了认识,大多数人都愉快地去了^⑮。上海九〇一厂的“工厂领导干部挨门逐户地做了家属工作,使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属愉快地欢送亲人支援内地建设”^⑯。还有当事人家属回忆,当时企业中首先动员那些比较老实的职工去皖南“支内”。

尽管如此,不同人群之间对内迁的态度仍是复杂的。中年职工牵挂家庭,老年职工担心客死他乡,女职工则多舍不得孩子,对于资本家、小业主、“四类分子”,因为头上有顶“帽子”,不敢公开表示不去^⑰。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上有所表现的机会,此外亦有诸如工作调动等各种考虑,不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503页。
③ 《关于支援内地建设的职工动员工作中若干具体政策的试行草案(内部掌握)》(1969年9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09-4-62-5。
④⑧ 《第一轻工业部关于搬迁4个单位去陕西的通知》(1966年10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7-46。
⑤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基建组关于后方小三线建设搬迁工作中若干问题请示报告》(1966年7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26。
⑥⑦ 《关于加强支援内地建设的几点意见的通知》(1970年6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54-6-116-29。
⑨ 《关于加强支援内地建设的几点意见的通知》(1970年6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54-6-116-29。
⑩ 《筹建上海后方印刷厂初步规划》,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46-1-342-1。
⑪ 《上海良工阀门厂市委四清工作队关于坚持思想第一、放手发动群众、良工阀门厂支援自贡阀门厂思想政治工作几点做法的材料》(196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5-52。
⑫ 《关于迁建工作会议情况简报(一)》(1965年9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5-130。
⑬ 《关于迁建工作会议情况简报(三)》(1965年9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5-139。
⑭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迁厂动员工作中各类职工思想特点的分析报告》(1965年2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3-63。
⑮ 《关于迁建工作会议情况简报(二)》(1965年9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5-135。
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502页。
⑰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迁厂动员工作中各类职工思想特点的分析报告》(1965年2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43-63。

而足。原上海皖南小三线八五钢厂副厂长许汝钟在回忆当年去皖南时,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变换当时不如意的工作环境,但只有三岁的小孩又让他心有不舍,在面对国家的号召和动员时,各种因素都交织在一起了^①。应该说,在响应国家号召和动员时,每个人内心的考量都是不同的。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看,在经过思想政治动员后,职工内迁的主要推力已经形成,但上海与皖南山区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仍是无法忽视的阻力,因此,尽可能地消除经济上的阻碍对于内迁必不可少。为此,国家经委确立了内迁职工工资“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保证从一线迁往三线职工的工资标准不下降。对于粮食定量问题,1965年9月4日召开的全国迁建工作会议上规定“职工粮食定量标准,暂时执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期限是一年半^②。以此保证内迁工人在工资和口粮方面不受影响。另外,针对家庭牵挂问题,国家经委也规定,搬迁工厂的职工,最好能携带家属,如果暂时不能携带,也应争取迅速创造条件,在最短时间内搬去。留下的职工家属原来享受的医疗等福利待遇,一律不变^③。

在实际动员过程中,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动员指标,往往对小三线地区的生产生活困难有意掩饰,“艰苦方面讲得少,好的方面讲得多”,并开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条件和许诺^④。这种做法为职工在小三线的安置埋下了隐患。大中华橡胶一厂在动员时许诺,到内地每户可以发到大米、煤、木柴各一百斤,结果到了后什么也没有,工人意见很大。上海某厂党委副书记王新民到三线慰问时,被一位女工拉住大衣质问:“你说××(指皖南山区)不冷,你怎么还穿大衣?”^⑤基层干部的这些做法引起了上海市委高层的警觉。上海市委在1966年的一份文件中要求基层干部“介绍内地情况要实事求是……必须避免不切实际的宣传和许愿、不计后果的做法”^⑥。不过,市委的文件收效甚微。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动员指标是首要的,如实宣传内地的艰苦条件,则无疑是增加动员工作难度,对完成指标不利。因此,有意掩饰内地困难、进行不实宣传在基层动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

尽管小三线移民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现代人口迁移模型在小三线移民动员和迁出方面仍可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小三线移民中,社会经济因素依然是基本影响因素,但更显著的是政治因素。从沿海城市迁到内地山区,对大多数的工人及家属来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生活困难——物质短缺、夫妻分居、父母子女无人照料等等。在当时业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迁往内地无疑是个人在社会分层上的一次倒退。因而在动员工作的最初,大多遇到了工人们以及部分工厂领导层的抵触。尽管这不会影响到工厂内迁的既定事实,但仍构成了迁厂的障碍。这时政治动员就成了消弭不满情绪的工具。在动员过程中,不断拔高三线建设的重要战略价值,赋予内迁以崇高的政治意义,增加动员压力,使得工人、家属以及干部将三线内迁内化为自觉的行动,这就构成了职工内迁的主要推力。而内地和沿海城市巨大的经济落差、福利待遇等现实利益以及家庭关系受损则是内迁的障碍。为了保证内迁工作顺利进行,就必须在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有限的调和,对内迁工人在经济上进行适度的补偿。可以说,增加政治因素的推力,减少经济上的阻力是说服工人内迁的最合理选择。

二 进 山

上海小三线移民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组织的严密性。1968年,上海市规定“上海后方企业一律不得自行从所在地招收人员,以及从其他地区调入人员。凡需从当地招收人员的,应经主管局革委会审查同意后,送市劳动局革委会审查”^⑦。这意味着小三线的职工主要是来自上海市的计划调配。而职工和家属在进入小三线后,即纳入到工厂管理体系中,若要调回上海工作或者通过上大学、征兵等离开小三线,亦需要劳动部门的批准。小三线移民这种组织严密的特征,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职工人数

①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332页。

② 《关于解决上海迁入徽州地区企事业单位户口粮食的几点意见》,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73。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业卷》,第497页。

④⑤⑥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转发支援内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访问内迁企业的情况简报〉的通知》(1966年4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1-353-45

⑦ 《关于后方建设劳动工资等方面问题的报告》(1968年6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46-1-190-62。

的变化来精确还原小三线移民的全过程。

职工的迁入与三线厂的迁建是同步进行的。第一批 15 个迁建单位从 1966 年 3 月陆续开工建设^①。1966 年春至 1969 年冬,上海先后在安徽皖南旌德白地、孙村、蔡家桥、桥埠和旌阳建成或开工建设井冈山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等 12 个小三线企业以及 3 个配套服务性单位,并在旌阳设立了上海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伴随着小三线厂的迁建,上海职工随之迁入,到 1969 年年底,小三线在旌德县内的职工人数已达 9000 余人^②。这其中包括 1968 年直接分配到皖南小三线的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和学徒共计 1400 余人,其中大专毕业生 190 人,中专毕业生 290 人,学徒 910 人^③。上海小三线企业在 1970 年之前是不被允许从当地或者外地招收职工的,因而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的职工是直接来自于上海的行政调配。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战争危机加剧,并直接刺激了 1969~1971 年间三线建设出现一个新高潮,上海小三线也不例外。1969 年,上海小三线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5200 万元,土建面积 18 万平方米,相当于前三年工作量的总和^④。而 1970 年为了抢建以五七高炮为重点的项目^⑤,投资大幅度增加到 12 712 万元,竣工土建面积 39 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四年的总和。建成投产的工厂数大幅度增加,1969 年基本投产的工厂是 7 个,到 1970 年增加到 21 个,生产品种从 1969 年的 26 个增加到 1970 年的 78 个。1971 年继续投资 10 086 万元,土建面积 20 万平方米^⑥。上海小三线的军工厂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⑦。到了 1972 年,基本建设投资开始回落,下降为 8588.9 万元。1972 年的投资主要用于扫尾、扩建和补缺,诸如修建仓库、宿舍、供水设备、冷库、粮库、中学、医务室等配套设施,只有少数如金星化工厂、红星化工厂、卫星化工厂、胜利水泥厂等是续建或扩建,而其他基本上已经建设完成^⑧。1973 年的基建投资进一步下降到 5425.2 万元^⑨。上海小三线的建设高潮过去,主体工程建设已大体完成。

由于小三线厂建设征用部分耕地,招收征地农民进厂的要求随着工厂完工而逐渐强烈。截至 1970 年,三线厂在皖南共计征地 4093 亩,在浙江昌化征地 187 亩,主要集中在绩溪、旌德、宁国三县。皖南地区地少人多,一般人均土地一亩左右,征地之后劳动力过剩矛盾更加突出^⑩。由于在工厂兴建之初,征地农民尚可以到工地打短工,获取工资,征地对农民的生计影响不大,但是工程结束后,生计问题即刻凸显,因而迫切要求工厂招工。在这种情况下,小三线厂开始陆续吸收了一批征地农民进厂^⑪。在这之后几年中,征地农民成为小三线职工的来源之一,如 1972 年仪表电讯公司新增固定职工 882 人,其中征地工 244 人,占新增职工总数的 27.78%^⑫。对这一时期移民规模的估计,需从新增职工人数中扣除那些来自当地的征地工人数。由于缺少 1972 年小三线全体职工总数,而只有仪电公司下属的 20 个工厂的职工数据,因此此处以仪电公司的数据进行估算。仪电公司从 1974~1983 年历年职工人数占小三线全体职工人数的比重大致稳定保持在 21%~23%之间,而 1972 年仪电公司

① 《关于后方建设搬迁工作中若干问题请示报告》(1966 年 7 月 2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7-2-26。

② 旌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旌德县志(1978~2003)》,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315 页。

③ 《关于六八年分配去上海小三线工作的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和新招收学徒工资待遇、生活津贴按当地标准执行的报告》(1969 年 9 月 27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46-1-211-61。

④ 《关于上海小三线 1970 年基本建设计划的请示》(1970 年 4 月 29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46-1-342-248。

⑤ 《关于上海小三线 1970 年基本建设计划的通知》(1970 年 6 月 9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03-4-228-106。

⑥ 《关于安排上海小三线一九七一年基本建设计划的请示》(1971 年 4 月 2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46-1-406-1。

⑦ 《后方小三线 1971 年常规兵器工业基本情况统计表》(1971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7-1-9。

⑧ 《关于下达 1972 年小三线基建计划的通知》(1972 年 7 月 24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6-1-11-55。

⑨ 《关于下达 1973 年小三线基建计划(明细项目)的通知》(1973 年 7 月 16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6-1-21-66。

⑩ 《上海市劳动局革委会关于皖南后方企业吸收一部分征地农民的请示报告》(1970 年 10 月 17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3-119-18。

⑪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八一二”指挥部需要安排征地农民的情况调查》(1970 年 11 月 10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3-119-30。

⑫ 《八一二指挥部第四工区填报的 1972 年固定职工人数增减变动情况表》(1972 年 9 月 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70-1-33-1。

职工人数为 8703 人,新增固定职工 882 人,如按照 22% 计算,1972 年小三线全体职工大致为 39 559 人,新增职工 4009 人。在这些新增职工当中,如果按照 27.78% 的征地工计算,即有 1114 名征地工。这个数据与 1970 年档案中直接记载的招收征地工一千余人的规模大体相当^①,因而 1972 年征地工人数的估计是比较可靠的。由此推算,1972 年从上海净迁入皖南小三线的移民人数约 3000 人。

征地工基本上集中在 1970~1973 年间。小三线厂的基建大体停止后,也就无须再大规模征地。此后,从农村招工进厂的人数锐减。例如,后方基地轻工局 1974 年新增固定职工 950 人,其中 933 人是从上海的固定职工调入,9 人是统一分配的技校、卫校、师范学校毕业生^②,此时新增职工的来源中,已经基本不见征地工的身影了。上海市与皖南小三线之间的人口迁移,重新回到最初的封闭状态,即人口迁移以上海迁往皖南为主,皖南回流上海为辅,而与外界的人员交换很少。

由于职工内迁是与三线厂的迁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 70 年代初期的建设高潮过后,由于没有大规模新建工厂,职工人数的增加也趋于平稳。在 70 年代中后期,皖南小三线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一批移民是 1975 年年底上海分配一万余名无去向代训艺徒。

当时,上海市劳动部门正在为如何安排外地的代训艺徒而感到棘手。1971 年到 1973 年 3 年内,上海为外地代训的学徒共计 4.3 万人,其中大部分陆续回到外地。但是到 1975 年 11 月,仍有 1.25 万名的代训艺徒外省市不愿意接收。尽管上海市曾就此与外省市和国家计委劳动局多次协商,但由于各省市都在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之劳动指标控制比较紧,外省市仍不肯接收。麻烦不仅于此,代训学徒在进上海培训之初,便明确未来安置回外地,如果此时安排到上海的工厂,则容易引起已去外地的代训学徒及其家长的思想波动。因而如何安置代训艺徒显得进退两难。而与此同时,正好皖南小三线向上海市劳动局提出增加劳动力的要求。由于自 1975 年年初开始小三线的生产指标大幅度提高,如遵义厂原设计每年生产单路载波机 350 台,但在 1975 年被要求生产 3500 台;东方红厂原规划生产固体电路 5 万件,此时被要求生产 50 万件;为民磁性材料厂的生产任务则比原计划大幅度提高了 16 倍。为此,后方基地便向上海市劳动局要求增加劳动力,调拨 1500 人进后方,9 月份又进一步要求调拨 2000 人^③。小三线增加劳动力的需求正好与当时无法安置代训艺徒的问题碰到一起,于是上海市便决定将这 1.25 万名代训学徒分配到后方小三线和四个原料基地工作^④。

在此影响下,小三线职工人数迅速增加,从 1974 年的 41 577 人,增加到 1975 年的 58 146 人和 1976 年的 60 810 人。后方轻工公司 1975 年新增加固定职工 2020 人中,1415 人是代训艺徒;机电公司是年新增固定职工 921 人,其中代训艺徒 582 人^⑤。在 1975~1976 年间代训艺徒基本上集中安置完毕。到 1977 年,整个皖南小三线安置代训艺徒 1753 人,而到 1980 年安置的代训艺徒仅有 50 人^⑥。虽然最初计划安置代训艺徒一万人,但到 1981 年,共在小三线安置了 17 200 余艺徒^⑦。

代训艺徒的集中到来,给上海皖南小三线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小三线一时间无法吸收这些青年艺徒,职工总数的迅速增加,直接导致了 1976 年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12%,而作为代训艺徒主要接收单位的轻工公司和机电公司,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轻工公司人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27%,机电公司下降了 25%^⑧。另外,代训艺徒在工种上并不能满足小三线企业的需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对分配下来的 2700 人进行摸底发现,有些工种大量过剩,尤其是车工、钳工、电焊工、无线电修理等均过剩,而对于后方有需要的炊事员、司机、漆工、泥木工、电镀、钣金、线切割等工种却缺口很大,造成安置困难^⑨。此外,由于代训艺徒绝大多数是男性未婚青年,他们的集中到来使得小三线的男女比

①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八一二”指挥部需要安排征地农民的情况调查》(1970 年 11 月 10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3-119-30。

②⑤⑧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 1974 年至 1976 年劳动工资年报表》(1974~1976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7-1-52。

③ 《上海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申请劳动力及职工子女安排问题报告》(1975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70-2-82。

④ 《关于动员 12 500 名代训学徒去后方小三线和原料基地工作的请示》(1975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27-3-170-19。

⑥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 1979 年劳动工资年报表》(1979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7-1-114。

⑦ 《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1981 年 7 月 1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9-405。

⑧ 《关于招收无去向代训艺徒工作小结》(1975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70-2-83。

例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加剧了小三线的婚配困难^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建设和工人进驻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便基本停止。除了 1975 年大规模的代训学徒进入外,在 70 年代中后期到 80 年代间,上海对小三线人口输出的规模并不大,从小三线回流上海的职工人数也不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小三线各个工厂的职工人数变动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个特征。小三线职工总数在 1976 年达到 6 万人的峰值(职工 60 607 人,家属 15 901 人,合计 76 508 人)^②,此后则逐渐减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维持在 5.6 万人上下,工厂职工基本稳定,既没有大规模的职工迁入,也没有大规模的职工迁出。人口流动的停滞造成的后果之一,是随着职工年岁的增长,企业技术力量和生产骨干出现断层。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小三线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普遍超过 50 岁,而一线的生产工人绝大多数超过 28 岁,炼钢炉前工、电子仪表精细加工、机床剃刮工甚至处于无人接替的状况^③。

至 1981 年,上海皖南小三线共有职工 56 240 余人,其中从上海去的约 47 400 人,占 84%,包括由上海老厂动员去的职工 16 600 余人,大专、中专、卫校和 1968、1969 届技校统一分配的约 8500 人,1975~1976 年安排的无去向代训艺徒等约 17 200 人,高初中毕业生分配的约 2800 人,其他本市调入的约 2300 人^④。从外地调入人口 8840 人,占 16%,包括为解决上海职工夫妻分居问题调入小三线的 2300 人,从外省市回收支农工和退休顶替的 3100 人,因小三线建设需要调入技术管理骨干及落实政策安排等 900 人,其中夫妇双方均为外地的 840 人,当地征地工及其家属约 1700 人^⑤。

三 安 置

尽管三线建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但数万人进山后,安置工作仍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住房又是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小三线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选址布局多在隐蔽的山区密林间,缺乏必要的生活设施。为了优先保证生产建设,职工住房建设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按照“节俭办工厂”和生活用房节俭的原则,职工住房多就地取材,以仿照皖南当地农村的“干打垒”或者砧木结构的住房为主。相对于城里的楼房,农村“干打垒”便显得十分简陋。房屋多为平房,按定制,地面一般做 10 厘米灰土地面或原土夯实,铺上 5 厘米厚的卵石。墙体则为全空斗墙,内墙刷柴泥,外墙做纸筋面层或清水墙。木门、木地板、木楼梯等刷桐油。多数房屋不做地基,只用原土夯实,因而房屋并不牢靠。即便如此,为了尽可能减少非生产性支出,各厂在建造职工宿舍时,仍以单身宿舍为主,按全厂人数 85% 计算建造,每人 3.5~4 平方米,而家属宿舍则按全厂人数的 15% 计算建造^⑥。这种以单身宿舍为主的住房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职工家属的随迁。而在有限的家属宿舍中,又以中小户型为主(小户为一间卧室,两户合用厨房,建筑面积 22.0 平方米;中户为大小各一间,厨房合用或独用,建筑面积 33.0 平方米;大户为二间卧室,并有厨房,建筑面积 44.0 平方米),大、中、小户的比例,一般按小户 45%,中户 40%,大户 15%^⑦。因此,小三线在住房问题上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尽管政府意识到家属随迁对于职工扎根山区的重要性,也曾在不同场合要求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家属随迁,但是在职工住房的建造和安排上,却背道而驰,严重制约了家属的内迁。上海市政府对此曾表示宜“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逐步解决”^⑧,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整个 20 世纪七八十年

①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1980 年 6 月 20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9-257-13。

②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后方职工和家属人数年度统计表》(1976 年 12 月 2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7-2-282。

③ 《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经委、国防科工办对上海小三线调整的请示、报告》(1984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46-4-787。

④ 《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1981 年 7 月 1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9-405。

⑤ 《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中人员安置意见的请示的说明》(未刊稿)(1986 年 5 月 6 日),转引自崔海霞:《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 2013 年,第 41 页。

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组关于生活用房建筑标准的批复》(1967 年 12 月 2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46-1-106-22。

⑦ 《八一二指挥部关于调整后方工厂生活用房建筑标准的通知》(1970 年 2 月 28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54-6-116-26。

⑧ 《关于后方小三线建设搬迁工作中若干问题请示报告》(1966 年 7 月 2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67-2-26。

代,小三线的家属人数比例始终未超过 20%。家属宿舍的短缺后来逐渐演变成小三线安置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后方基地管理局在给上海市的一份报告中称:“有的已结婚仍住男女集体宿舍,如火炬厂在国防工业大检查中发现一间妈妈宿舍中住三位已结婚的带孩子的女同志,晚上三顶帐子实际上住有三户人家,影响很不好。”而即便是这样的集体宿舍也十分紧张,有些职工不得不住在工厂的活动室、招待所、办公室、仓库等房之内,甚至住在单位的理发室、豆腐坊等^①。

住房条件的限制不仅影响到已婚职工的家属内迁,也影响到了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随着年岁的增长,青年职工结婚的要求越发强烈,但是家属宿舍的短缺却是一道难题。后方基地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称:“家属宿舍的建设仅七四年、七五年安排过二千户,七六年、七七年均未安排。目前(指 1978 年)已结婚没有住房的达九百多户,今年要结婚的近一千三百户,除了已在建设的家属宿舍解决六百户外,今年到年底结婚无住房的将近一千六百户。”^②

青年职工结婚在 70 年代前期出现,之后逐渐成为安置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难题。住房的限制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小三线厂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布局结构。小三线厂所需工种以男性为主,造成企业内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例如贵池钢厂职工人数 5000 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男工。而 1975 年上海市将万余名代训艺徒集中安置到后方基地,造成小三线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小三线的婚姻困难^③。加之后方工厂地处偏僻山沟,对外联系困难,青年职工难觅对象。据统计,到 1980 年,整个上海皖南小三线共有未婚男青年 13 072 人^④,其中 30 周岁以上的有 1015 人^⑤。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使得“未婚职工长期不能安心三线建设,因而向中央、市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来信、来访日益增多,要求调沪工作的也越来越多”^⑥。

然而婚姻问题在 70 年代并未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重视。早在 1973 年,贵池钢厂曾就 1000 余名青年恋爱、婚姻困难的问题向上海市有关部门请求解决^⑦,但并无下文。婚姻问题逐渐成为小三线职工无法安心扎根皖南的原因之一。直到 80 年代初,小三线面临军工订单大幅度下降和“军转民”的严峻形势,作为使小三线职工安心扎根皖南的补救性措施之一,上海市才开始着手修补小三线职工的婚姻问题。1980 年 6 月 20 日,上海市国防办出台《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提出:1. 劳动局每年下达给后方招工指标;2. 从市属农场招收未婚女青年为正式职工进小三线;3. 小三线职工自找对象后可到三线厂落户、工作;4. 从市区街道里弄找对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如愿意将户口迁入三线厂,可吸收为正式职工;5. 35 岁以上仍找不到对象的可找农村姑娘,婚后转吃商品粮,并吸收为三线生活福利集体事业职工^⑧。此后,小三线厂纷纷开始扮演“红娘”角色,积极为厂青年职工寻觅对象。1981 年 11 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 24 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等报刊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⑨。据称,上海小三线先后有 3000 名青年在这前后解决了婚姻问题^⑩。

上海皖南小三线职工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副食品、日用品等主要由上海供应。其中粮油指标是

①③ 《关于后方小三线体制和急需解决几个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附件二之四关于职工生活用房问题的情况和意见》(1978 年 8 月 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370。

④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1980 年 6 月 20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9-257-13。

⑤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上海小三线未婚青年职工婚姻问题的意见和本局贯彻意见及情况汇报》(1980 年 7 月 9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595。

⑥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小三线男青年婚姻问题修改意见》(1980 年 6 月 25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9-257。

⑦ 《关于后方小三线体制和急需解决几个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附件二之十九关于后方 30 岁以上职工的婚姻问题》(1978 年 8 月 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370。

⑧ 《关于解决本厂大批男青年对象问题的报告》,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1987 年,第 47 页。

⑨ 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第 144 页。

⑩ 曹晓波:《满腔热情做红娘 皖南迎来好姑娘——后方基地成立二十四个婚姻介绍所》,《新民晚报》,1982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八五钢厂团委启事 为我厂男青年寻找对象》,《青年报》,1980 年 10 月 10 日,第 3 版。

⑪ 史志定:《后方基地三千青工喜结良缘》,《上海工运》,1983 年 2 月 25 日,第 2~3 版夹缝。

从上海转拨到安徽,再由安徽省粮食厅下拨到基层^①。而自1970年6月起,对肥皂、香烟、食糖、胶鞋、牙刷、牙膏、面盆等三十种商品,由上海商业部门采取临时供应的办法^②。除了当地的商业网点外,各个厂都设有自己的小卖部,生活用品通过小卖部自行销售。蔬菜供应相对困难,主要从当地县城购买,或者通过搞“五七生产”,由工厂自行开荒种地,补充蔬菜等副食品,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年底,上海小三线共开垦荒地3000多亩,收获各种蔬菜1733万斤,养猪2万余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副食品供应困难^③。此外,小三线职工也在闲暇时间捕捉鱼虾、螃蟹、田鸡、黄鳝等,或者私下向当地农民购买鸡蛋、山核桃等土产,作为副食品的补充^④。

前文已述,为了减少动员阻力,中央曾于1965年规定内迁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就高不就低”,为期是半年到一年^⑤。这一政策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逐步被调整为“向当地看齐”。1969年11月10日,安徽省在《关于上海市在我省进行三线建设人员口粮供应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凡上海市三线厂的职工及其家属的粮油关系转入我省的,其粮油供应标准,职工暂按原上海定量,食油一律按我省当地标准供应。”^⑥职工的粮食标准虽然维持不变,但食用油的供应标准已向安徽看齐,而三班制生产工人的夜餐粮补助,也是按安徽省的标准执行。副食品供应方面,1974年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要求“上海小三线的副食品供应,原则上应按当地标准供应”。日用品方面,尽管上海市要求“凡上海货源有可能,尽量挤一部分给以支持……但与上海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⑦。1975年,上海市提出“后方基地供应标准,原则上应向当地看齐”,在粮油、日用品、副食品等方面降低供应水平^⑧。这让小三线职工普遍觉得“吃亏”。到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准备对小三线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时发现,工人们物资供应水平的降低积怨已久。“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是生活标准上‘就低不就高’,工资标准安徽低于上海,照安徽的;粮食定量上海低于安徽,照上海的;布票安徽不发专用券,照安徽的;等等。这些看来是小问题,但关系职工切身利益,使三线职工感到吃亏了。”^⑨

此外,为了满足小三线职工子女教育需要,后方陆续成立了9所中学、39所小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共6000余人,但是限于师资力量和资源有限,教育质量堪忧^⑩。医疗卫生方面,小三线从1970年起先后设立了四家综合性医院(瑞金医院、古田医院、长江医院、天山医院),同时,每个工厂设立医务室。对于一些服务性的行业如理发、修补等,则通过组织职工家属自力更生解决^⑪。每星期一到两场的电影,是主要的文娱活动。

在空间布局高度分散且封闭的条件下,小三线厂不仅是一个生产性单位,也是一个社会保障机构,不仅承担了职工住房、婚姻等问题,还承接了教育、医疗、食品、生活物质供应等各方面的社会福利保障职责。由于小三线厂车间散布在群山之间,厂与厂之间、车间与车间之间的交通联系不便,因此各个厂就形成了“小而全”的后勤保障体系。位于贵池的八五钢厂在厂区附近建有西华、大冲、28K、八五新村四个家居区,除了81494平方米的住宅外,还有食堂、菜场、小卖部、理发室、托儿所等生活

①⑥ 《关于上海市在我省进行三线建设人员口粮供应问题的通知》(1969年11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35-4-178-26。

②⑦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关于615所、573厂、大屯煤矿、金山石化总厂、上海小三线、上海后方基地等商品价格、供应问题的请示及中共上海市委批复》(1974年11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48-2-683。

③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1988年,第53页。

④ 蒋美珍访谈记录(蒋时为上海后方基地长江医院司机),时间:2014年6月10日,地点:上海峨山路蒋美珍办公室,采访人:胡静。

⑤ 《关于解决上海迁入徽州地区企事业单位户口粮食的几点意见》(1968年12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73。

⑧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后方基地商品供应问题的意见》(1975年6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09-4-459-82。

⑨ 《中共上海市国防工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召开小三线上海市人民代表座谈会的会议纪要》(1982年4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9-837-10。

⑩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办公室基地党委关于后方小三线体制和急需解决几个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1978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370

⑪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关于商品供应措施和“小三线”职工供应等问题的请示、通知及市委的批复》(1971年6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48-2-340。

设施和小学、技校、幼儿园、卫生保健总站等文教卫生设施,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小社会”^①。

作为外来移民的小三线职工们在安置过程中离不开当地公社和农民的支持。当地农村对小三线的支援是多方面的,皖南地方政府和人民为了支援上海小三线建设,专门划出 9.27 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一部分还是旱涝保收的良田,供小三线单位征用。安徽地方政府还帮助上海小三线管理部分职工和家属的户口,处理一些较为紧迫的或涉及地方的治安事件^②。此外,当地农民也曾为小三线职工提供住宿,并协助解决生活中的部分实际困难^③。地方政府和当地农民的支持对于小三线职工的安置乃至整个小三线建设曾起到重要作用。

四 回 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争的阴云已逐渐散去。继续推进三线建设的必要性大为降低,军需订单随之大幅下降。1980 年上海小三线的军工生产任务较上年度下降了 44.8%,1981 年再下降 21.2%,总产值从 1980 年的 4.1 亿元继续下降到 3.2 亿元。上海小三线 54 个工厂中处于停建缓建、全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的约占厂数的 63%^④。1979 年,全后方上交国家利润 6770 万元,亏损企业 4 户;1980 年上缴利润 3023 万元,比 1979 年下降了 54%,亏损企业增至 10 户;1981 年,上缴利润仅 203 万元,又比上年下降了 93.3%,亏损企业扩大到 23 户,约占全部企业的 44.4%^⑤。在此形势下,对小三线进行战略性调整势在必行。国务院国防工办和国家计委、总参、五机部等在 1980 年对华东和华北地区小三线军工厂进行了调查,并于当年 11 月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国防工办的座谈会,着手布置小三线的调整事宜^⑥。此后,上海小三线便进入了 1980~1985 年的“军转民”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在“军转民”时期,强调的是小三线从军工向民品生产转型,政策意图层面仍然希望巩固和发展上海小三线,而不是解散和放弃小三线,是希望职工扎根皖南,而不是撤回上海。1980 年 11 月,上海市即着手准备调整工作,最先开始调整的是直接生产军品的 17 家军工厂^⑦。这 17 家军工厂中,除了九三三七厂和九三八三厂因其生产的新四〇火箭筒和新四〇火箭弹质量稳定且军队仍有需求外,其他 15 家军工厂均进行大规模的调整^⑧。

然而“军转民”并非易事。原本依赖军工订单的小三线在转向市场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小三线企业“山、散、洞”的地理分布格局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导致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小三线企业的生产原料需从上海运进皖南山区,形成产品后,又必须运回上海进行销售,往返八百余公里的路程极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因此,“军转民是一个难关,转型之后负担更加重了”^⑨。加之闭塞的山区也造成企业对市场信息不灵敏,销售困难。1983 年,小三线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6296 元,仅为上海市平均水平的 22%,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税 6.2 元,只有上海市平均水平的 9.1%,企业亏损比例和规模继续扩大^⑩。

形势的变化已使小三线职工的回沪意愿越来越强烈。1979 年 2 月,贵池钢厂少数青年职工以“68 届半中技 419 联络站”名义,在该厂驻沪办事处门口张贴海报,要求“落实政策”“重新分配”,安排

① 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第 4 页。

②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1988 年,第 50 页。

③ 洪明来访谈记录(洪原系原龙岗村村支部书记),采访时间:2012 年 5 月 21 日,地点:安徽省东至县香隅镇龙岗村,采访人:胡静。

④ 《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1981 年 7 月 1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9-405。

⑤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第 60~61 页。

⑥ 《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的报告》(1981 年 4 月 6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8-178-26。

⑦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小三线军工厂调整的意见》(1980 年 12 月 1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8-76-155。

⑧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小三线军工厂的通知》(1981 年 11 月 3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1-8-178-26。

⑨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 147 页。

⑩ 《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经委、国防科工办对上海小三线调整的请示、报告》(1984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B246-4-787。

回沪^①。有些青年职工则私下回沪设摊做生意^②。同时,也陆续出现小三线职工通过私下渠道回上海市区工厂企业就职的现象。对此,市政府发文禁止此类私招三线职工的做法,并要求市区各个单位在处理大、小三线职工要求回沪问题时,“应教育职工安心三线建设,并积极动员其家属调往大、小三线地区团聚,而不是擅自将职工调来本市工作”^③。为了将小三线职工稳定在当地,上海市政府针对小三线存在的诸如婚姻、户口、待遇、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自1980年起给小三线职工发放每人每月5元的“进山津贴”^④、为小三线招收适当的女工、从市区选派医生和教师支援皖南等等^⑤。然而这种小修小补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沿海城市与内地山区之间的经济落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三线职工无法长期扎根山区。1985年7月,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到小三线调查时,听到小三线干部职工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皖南工作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我们青春献给祖国也就算了,要我们子女也和父母一样,我们心里不平衡。”^⑥毛德宝当年在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从事党委信访工作,每年收到职工来信1000多封,其中最多的就是要求回上海。一方面山区条件艰苦,另一方面,许多小三线职工的父母小孩都留在上海,老人需要照顾,小孩需要教育,“家庭困难的加剧,大家更想回上海”^⑦。

“军转民”的困境并非上海一家独有,其他省市的小三线面临着类似的困难,这使得中央不得不重新思考小三线的未来出路。转折点出现在1984年,这年3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视察湖南小三线时,对小三线企业的发展方向、管理体制改革等做了新的指示。此后,上海市开始转变对小三线厂的政策,提出让小三线厂与郊区工业企业实行联合,将小三线厂和职工逐步接纳回上海^⑧。但是,当时上海市政府对小三线职工回城仍十分审慎。在关于小三线调整的市委常务会议上,上海市市长表示,“原则是,发展安徽;以联营的名义到郊区,进市区这个口子决不开”。朱宗葆则在皖南调研时表示,“我们来的时候,有先有后,走的时候也要有先有后”。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昌法称,“不能一哄而上搞回城风”^⑨。为此,上海市制定了“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企业、后机关,先工人、后干部,先职工、后领导,分期分批地安置职工返回上海市郊,安排职工分期分批地返沪^⑩。在此后的三年中,数万小三线职工陆陆续续回到上海,回城过程大体是平稳有序的。

① 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第106页。

② 《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后方青年中弃工经商问题严重》(1979年12月31日),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办公室编:《后方动态》(29期),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436。

③ 《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劳动局关于支援大小三线建设职工调沪问题的报告》(1980年5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27-6-90。

④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关于试行竣工三线进山工作津贴请示和市劳委的批复》(1980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2-599。

⑤ 《余琳、席炳午、张梦莹关于巩固和提高小三线的工作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汇报》(1980年4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9-194-51。

⑥⑦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43、170页。

⑧ 《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经委、国防科工办对上海小三线调整的请示、报告》(1984年7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246-4-787。

⑨ 王德敏(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秘书):《1985年安徽上海小三线调研日记》(未刊稿)。

⑩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第107页。

上海轻工系统在安徽“小三线”职工安置情况表

单位:人

职工/工厂	利民	曙光	红星	红光	光明	光辉	燎原	万里	公司	小计	
在册职工总数	357	459	744	597	1518	1410	1025	1365	68	7543	
小计	350	458	721	576	1454	1332	978	1292	68	7229	
回沪职工	全民	340	447	707	567	1409	1306	943	1247	68	7034
集体	10	11	14	9	45	26	35	45	—	195	
小计	7	1	23	21	64	78	47	73	—	314	
留皖职工	全民	7	1	23	19	61	77	45	71	—	304
集体	—	—	—	2	3	1	2	2	—	10	

资料来源:《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燎原厂外调2人未统计在内,另有光明厂2人劳改留皖。

到了1988年,绝大多数的小三线职工都已回沪。上海机电系统在皖南的11298名职工中,96.87%都按政策回沪^①。上海轻工系统在皖南的在册职工中,96.88%也都回到上海。整个后方基地回沪职工50994人,去外省市216人,安置留皖职工1469人^②。1989年年底,小三线返沪干部、职工52654人全部落实了安置单位。上海市为小三线职工安排建造了100万平方米的新房,分布在闵行、吴泾、莘庄、泗塘、吴淞、桃浦、浦东、松江、南翔、青浦等三十个规划地区。同时,前方主管局、联营老厂和后方企业还通过搭建临时过渡房、内部调剂、购买商品房的办法安置了一部分特困户,缓和了住房矛盾。^③到1990年年底,已有80%的职工分到了新房,返沪后的各项调整工作也基本结束^④。

五 小 结

从1965年陆续进山,到1988年全部撤回,七万余上海皖南小三线职工和家属经历了从城市到山区,再又回到城市的流转过程,前后共计24年。在最初动员进山时,曾号召职工扎根三线^⑤,并在后续的思想教育和相关政策中不断传递“扎根三线”的理念^⑥,然而,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在皖南落地长达20余载,却依然没有在当地生根。

在管理体制上,上海小三线虽然地处皖南,但本质上是上海的一块飞地。后方基地的职工由上海输入,资金由上海提供,工厂的原材料来自上海,产品也重新运回上海,工人们的粮食、蔬菜、香皂、香烟、自行车等日用品都由上海供应,甚至于电影放映都与上海同步。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和其他局级单位平行的后方基地管理局,来管理皖南山沟里的那些工厂和单位。虽然皖南的后方基地与上海市相隔400余公里,但仍然是上海的一部分。在性质上,小三线企业仅仅是上海企业在空间上搬迁到皖南而已。加之小三线厂的军工性质,具有高度保密性和封闭性,因而并未融入地方经济体系当中。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造成小三线职工与当地农村人口之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融合。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属于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尽管三线厂地处农村山区,但他们不可能融入到皖南的农村体系中去,而当地农民除了少数征地工外,更是无法逾越城乡壁垒,进入小三线厂的城市体系。小三线厂的男青年尽管找对象困难,但却极少娶当地女性,正是这种分隔的例证之一。体制上的分隔在无形中给小三线厂包裹了一层隔膜,使得它们几乎与皖南山区完全隔离开来。

① 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当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2页。

② 《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交接工作结束的报告》(1988年8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1-316。

③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第110~111页。

④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1990年工作回顾和1991年工作打算》(1991年1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67-1-313。

⑤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59页。

⑥ 如贵池钢厂在一份征地报告中称,贵池钢厂职工和家属过万人,请求征用梅街大队420亩的毛草山、林山等用于建设“五·七农场”,自行种植蔬菜,以弥补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目的是“使广大职工和家属扎根三线”[《关于征、拨土地申请书、协议书》(1976年2月29日),安徽贵池县档案馆藏,档号:15-90]。

依靠行政力量动员的小三线移民,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一旦外在的行政动员压力消失,人口迁移便出现反弹。尽管并不能否认部分职工在内迁时是完全自觉自愿的,但同样也不可否认,外在的动员和政治压力是将职工从上海推送到皖南的主要力量。支内行动要求职工们为了国家的战略需要牺牲个体的利益,这种集体主义的做法在当时是一种被鼓励和赞扬的政治道德。然而政治道德并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和物质的需求,对移民个人利益的损害,从根本上决定了小三线移民无法持久。“其实,到小三线大家都是不安心的,都想回上海。在那个地方,扎根比较难的,扎不下去。”^①鉴于皖南山区与上海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许多小三线的职工选择将妻子儿女留在上海而只身前往小三线。当时这种两地分居的状况相当普遍,因此,尽管许多小三线职工身在内地长达 10 余年甚至 20 余年,但其家庭、子女、父母等都在上海,因而根也还在上海。

当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外在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小三线职工回沪的意愿便集体宣泄出来。1985 年上海方面着手准备将小三线撤回上海后,后方厂的干部和工人都非常兴奋,他们对担任上海小三线调整工作小组副组长的李晓航说,“小三线调整是众望所归,没有一个人反对,都赞成,你干了一件大好事”。与 20 世纪 60 年代层层动员不同,小三线的职工们为了自己的企业能早点回上海,“大家拼命生产,赚足回上海重建的钱”,这时候“是不用动员的”^②。

在移民问题研究中,土客互动和矛盾是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着重从小三线发展演变的角度探讨小三线移民主体从城市进山,再从山区回城的历史过程,以此作为了解小三线发展演变的一个切入点。小三线与当地政府、公社、生产队以及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小三线研究的重要方面。当时城乡之间的体制性分隔不仅造成小三线移民无法扎根当地,也使得小三线职工与当地农民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有别于通常移民问题中的外来移民与原住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此,笔者将另撰文单独探讨小三线与当地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

收稿日期 2014-11-20

作者陈熙,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上海,200433;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44。

Rootless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Migration for the Shanghai and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Rear Basement Construction

Chen Xi and Xu Youwei

Abstract: The Littl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LTFC) was carried out in the way of transferring the factories in the coastal areas into the interior, therefore, the migration of workers and their family dependents from east to west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More than 70 thousand of workers and family dependents of Shanghai's LTFC which located at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southern Anhui, had been transferred from urban to rural, and then return cities one or two decades later.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raise and decline of LTFC could become a very good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evolution of LTFC. This study shows that it's impossible to arrange the workers and family dependents in interior areas by the way relying solely 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gnoring migrant's economic interests. Those migrants could't rooted into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ern Anhui even though most of them had been living there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Keywords: Shanghai Rear Basement; southern Anhui; Littl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migration

【责任编辑 豫 蓉】

①②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 139、31 页。